“中国梦”的文化阐释

马国柱 孟庆艳

“中国梦”作为凝聚着中国文化元素的思想品牌,它一经提出就具有了文化的象征意义,具有统摄人性生成功能和塑造人类文化的作用。当“中国梦”作为文化的表现功能时,它充分体现了文化的全面适用性,打开通向世界之门,让“中国梦”走向世界;它充分体现了文化的差异性,区分各种关系,铸造民族文化的个性;它充分体现了文化的创造性,赋予主体一种创新的能力,实现“中国梦”的价值。“中国梦”的文化表现性表征了它的价值:振奋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认同中国道路,感受中国形象。

“中国梦”的文化维度

2012 年11月29日,习近平同志带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参观中国国家博物馆“复兴之路”展览时指出:“我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个梦想,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其后,习近平同志对中国梦的内涵进行了丰富,进一步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既深深体现了今天中国人的理想,也深深反映了我们先人们不懈追求进步的光荣传统”“中国梦是历史的、现实的,也是未来的。”“中国梦是国家的、民族的,也是每一个中国人的。”“中国梦”作为凝聚着中国文化元素的思想标识,是中华民族悠久文化和马克思主义先进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既承载着中国传统文化中积极向上、生生不息的要素,又承载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具有特定的文化价值。

第一,从空间维度上看,综观“中国梦”在一个总体化的体系中指定这个对象的位置并规定它在体系中的地位。从世界范围而言,“中国梦”是宣言书,它表达了中国人民的夙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我们要实现的中国梦,不仅造福中国人民,而且造福各国人民。随着国力不断增强,中国将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承担更多国际责任和义务,为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作出更大贡献。

第二,从时间维度上看,“中国梦”指向时间的第三维——未来之维,“中国梦”是对中国未来的一个指向,是中国人的梦想。一般而言,我们常常关注时间的两个维度,现在与过去的关联,然而,对人类生活结构似乎更为重要更足以表现其特征的方面是未来之维。在我们的时间意识中,未来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正如恩斯特·卡西尔在《人论》中所说“思考着未来,生活在未来,这乃是人的本性的一个必要部分。”

第三,从文化维度看,“中国梦”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其价值维度就是优化自己的生命存在所追求的意义,是对不同主体的理想的生存状态所做出的肯定(或否定)。通过人化的实践活动,“中国梦”呈现出一个对象性的存在,在此意义上,“中国梦是国家的、民族的,也是每一个中国人的。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只有每个人都为美好梦想而奋斗,才能汇聚起实现中国梦的磅礴力量。”这样,“中国梦”从不同的价值主体的层面,肯定中国人民对未来理想充满信心。“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它弘扬了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体现了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彰显了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文化传统,表征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民族精神。

“中国梦”的文化表现功能

“中国梦”的文化表现是通过“表达什么”和“如何表达的”这两个功能来实现的,它使中国人与世界各国人民的关系联系起来。在此意义下,“中国梦”向世界人民表达中国人的梦想,同时表达“中国梦”的民族文化个性、文化创造性、文化包容性和文化象征性。

1.“中国梦”表现了民族文化个性。培育中华民族的文化个性,实现民族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的转化,构建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促进世界文化的健康和谐发展。在现当代整个世界转型过程中培育中华民族的民族认同和文化身份意识,提高了民族文化的自觉精神。那么如何培育中华民族的文化个性,从个体的人做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任何个人都是在共同体中,以特定文化同一性方式存在的。中华民族就是一个共同体,共同体意味着整体性和集体性。尽管在社会身份上存在多种多样的差别。文化交流、对话与交往以文化个性为基础和前提,差异性是交流与沟通的意义所在。

2.“中国梦”表现了文化创造性。“中国梦”作为凝结着中国文化元素的符号,它演化生命形式,塑造人性,创造文明。文化作为人类的生命生成方式,其根本意义在于生命生成的超越性、自由性,在于生命生成的自觉性,在于创造,在于构建民族的精神家园。这种文化创造活动在于服务于人的生活、提升人的生活质量、优化人的生命存在。实践是人成为人的根源,文化则统摄着人的存在和人的生成。通过创造性提高中华民族的文化软实力,通过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进而提升我国的综合实力,赢得国际竞争力和广泛的国际认同。

3.“中国梦”表现了文化包容性。文化的包容性就是兼收并蓄和求同存异。“中国梦”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梦,在此条件下,我们中国人与其他各国人民进行文化交往的过程中,就要求同存异。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国人自古就主张和而不同。我们希望,国与国之间、不同文明之间能够平等交流、相互借鉴、共同进步,各国人民都能够共享世界经济科技发展的成果,各国人民的意愿都能够得到尊重,各国能够齐心协力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坚持开放包容,为促进共同发展提供广阔空间。‘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我们应该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消除疑虑和隔阂,把世界多样性和各国差异性转化为发展活力和动力。我们要秉持开放精神,积极借鉴其他地区发展经验,共享发展资源,推进区域合作。”

4.“中国梦”表现了文化象征性。象征性是人类内心世界的一种期待,是人类心灵最显著的、最真实的外化,是一个被人格化的表现,蕴涵着强大的超越性精神力量,人们的思想、愿望等精神性的东西都凝结到标志符号上。它的主要意义在于创造某种人格理想或精神境界。一旦某些事物或图形成为象征角色时,它们就具有了超凡的魔力,并且深深地影响着人们的精神及行为方式。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把中国的机遇转变为世界的机遇,在追梦的过程中展现出中华文明的独特魅力。“中国梦”是全体中国人民的期待:既是民族的文化期待,又是每一个人的文化期待。

“中国梦”的文化内涵

“中国梦”向世界表达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理念,它体现着中华民族的文化个性、创造性、包容性和象征性,特别是在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主题中,表现着“中国梦”的文化意义,对此,我们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理解:

1.振奋中国精神。中国精神就是“民族魂”,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思想的开拓者。中国精神是“中国梦”核心凝聚力。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是我们民族几千年来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血脉,是长期形成的团结的力量。有了这样的民族精神,我们就能传承优秀民族文化基因,将中华民族凝聚在一起。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我们的时代步伐,有了这样的时代精神,我们就能扩大视野,借鉴吸收世界各个国家一切对我有利的部分,兼收并蓄、与时俱进地发展自己,形成巨大的力量。

2.凝聚中国力量。中国力量就是中国各族人民大团结的力量。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是中国力量的体现者。在强调人民群众的主体力量的同时,每一个个人的历史主体的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要充分肯定个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

3.认同中国道路。实现中国梦,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历史证明,这是一条符合中国国情、富民强国的正确道路,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道路选择正确,民族复兴、国家发展就会步入坦途,人民就会幸福和安康;道路选择错误,民族复兴、国家发展就会遭受挫折,人民也会痛苦和受难。当今中国之所以能够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正是由于我们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伟大实践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的持续探索中,在对近代以来170 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在对中华民族5000 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来之不易,必须珍惜,必须坚持走下去。

4.感受中国形象。这将是一道亮丽的社会景观。当中国实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形象就是一个民族的大写的整体性人格境界。在新的历史时期,让人们感受“中国梦”的本质。“中国梦的本质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我们的奋斗目标是,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在2010年基础上翻一番,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敦煌文献回归的新时代

韩春平

今年,敦煌研究院与法国国家图书馆在莫高窟签署合作协议,法方拟向敦煌研究院赠送馆藏敦煌文献数字化副本,无偿提供给非商业化应用。协议的签署,意味着海外敦煌文献将首次以高清晰数字彩色图像形式实现虚拟回归,文献回归跨入新的时代。

百年回归梦

自1907年英籍匈牙利探险家斯坦因前来莫高窟劫取敦煌文献之后,法国人伯希和、日本人橘瑞超、俄国人奥登堡等闻风而至,纷纷打着考察旗号趁火打劫,很快6万余件敦煌文献大半被劫掠而去。敦煌文献惨遭浩劫,使国人扼腕慨叹。如何让流失文献回归故土,从此成了国人心中一个沉痛的梦想、一个100多年难以完全实现的期盼。

从文献流失海外伊始,我国学者就没有一刻停止为文献回归而付出努力。新中国成立之前,许多学者远涉重洋前往英、法等国,主要通过抄录方式让文献回归故土。刘复、王重民、姜亮夫、王庆菽等都曾在抄录文献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为文献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尽管相关抄录成果堪称丰富,但是与数以万计的流失文献总量相比,毕竟只是九牛一毛。

与抄录相比,摄影具有速度快、效率高、无纰漏、能逼真反映载体面貌等优点,因而是文献回归的理想方式。早期的摄影文献数量非常有限,质量普遍偏低。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英、中、法三国的主要藏品先后被摄制成缩微胶卷并相互交换使用。但是缩微胶卷阅读极为不便,并且拷贝昂贵,典藏极少,难于共享。到了80年代,台湾学者黄永武将既有的三国藏品胶卷影印为140册大型图录《敦煌宝藏》;90年代以来,不仅英、法藏品有了重拍精印本,俄藏文献影印图录也首次出版。这样,流失文献借助缩微胶卷和图录拓宽了回归之路,极大地推动了我国学者的研究工作。

由于缩微胶卷、影印图录等摄影作品基本都是黑白图像,且不少作品品相低劣,既有作品又均未涵盖海外各收藏地全部藏品,因此文献的回归仍然不尽人意。进入数字化时代,通过数字技术设施可以轻松采集和共享流失文献的数字图像,由此出现了一种崭新的文献回归方式虚拟回归。只是从敦煌文献20多年的数字化历程来看,虚拟回归之路依旧道阻且长,过去国内相关数据库大都只有文献的低像素黑白图像,多国合作的国际敦煌项目IDP网站虽然不断上传海外藏品的高清彩图,但开发严重滞后,中国学者拥有开发优势却爱莫能助。不过在今天,这一窘况正在走向终结。

为虚拟回归开新路

实现敦煌文献高清彩图的虚拟回归,是数字化时代国人对文献虚拟回归的最大愿望。本次法藏敦煌文献高清彩图的虚拟回归,是敦煌研究院领导和员工努力付出的结果,与法方的谈判和签字仪式就是在院长王旭东积极推动和亲自参与下实现的。王旭东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希望把与法国的合作作为模式,应用到与其他国家的合作之中,并准备于下半年赴英国洽谈合作事宜。尽管海外敦煌文献藏量较多,藏地分散,完成虚拟回归的后续任务殊非易事,但是王旭东和他的团队正在进行精心的准备。

近20年来,敦煌研究院文献研究所所长马德一直致力于敦煌文献的数字化建设和虚拟回归,不过实现文献高清彩图的回归却长期停留在理想层面。2012年,马德作为首席专家组织申报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敦煌遗书数据库建设”获批立项,这是国内基于敦煌文献所资助的最高级别的数字化项目。立项以来,马德多次表示,项目组应该充分做好建库工作,并以敦煌遗书数据库为依托,积极准备与海外敦煌文献收藏单位开展合作,或争取共享海外藏品的高清彩图,最终将流散在海内外各地的文献高清彩图全部收入数据库加以开发。今年4月,他从兰州赶往敦煌出席中法双方合作谈判,不久就传出了签署协议的好消息。

超越回归

近年以来,我国正在有计划、有步骤地实施流失海外古籍文献的回归工程,并已取得显著成效。甘肃省人大今年5月制定的《敦煌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草案更是鼓励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民间组织和个人以回购、受赠等形式参与海内外流失流散文物保护工作,这无疑有利于推动敦煌文献的实物回归。实物回归可以复原文献固有的文化信息链,恢复文物生态的完整性,并在文化传承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在未能实现实物回归之时,通过虚拟回归获得文献的高清彩图,其意义也非同寻常。我们无须掩饰对敦煌文献实物回归的愿望,但今天我们需要以更加开阔的眼界,超越回归来看待回归、回归的意义,只有超越回归才能看得更加分明。不论实物回归还是虚拟回归,回归都不是最终目的,它不应该是终点,而应该是起点。做好回归后的工作,才能在文献回归的新时代续写新的篇章。

对于回归后的敦煌文献,首先不应以追求藏量为目的,更不应该因为藏量的增加而遽自矜大,否则将走向回归的反面。必须清楚,即便是实物回归,也应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与世界共享,进行中外合作开发。敦煌研究院与法国国家图书馆合作协议也明确约定:双方今后将围绕文献的数字化和学术交流等开展有关人员培训、访问研究等方面的合作,这无疑是对回归的准确定位。其次就虚拟回归的文献数字化副本而言,不能存储于服务器了事,而应该在进行数据化处理的基础上实现深度挖潜,使数据库提升为知识库,因为不是“数字化+数据库”,而是“数据化+知识库”,才是虚拟回归的下一个目标。

英雄的艺术与艺术的英雄

——话剧《生如夏花》的典型方志敏

汾 灵

毫无疑问,塑造英雄人物是文艺永恒不变的主题。这首先是因为,英雄的存在是我们生活的基本事实。在恩格斯所讲的历史合力的作用下,人类命运的前行正如大河奔流,时而岸平野阔、舒缓宁静,时而高峡险滩、急湍猛浪,时而阳光和煦、婉转明媚,时而狂风暴雨、浊浪排空。在这种前行中,总有一些人,他们更加深沉地继承了历史文化的精髓,更加清醒地意识到了群体命运的轨迹,他们具有更加丰富的智慧和才华,更加坚强不屈的意志和品格,因而他们在思想、能力、道德和创造中,较为突出地代表了社会成员的集体意愿和理想追求,他们被奉为英雄。越是宏大的事业,这种英雄就越是层出不穷地涌现,越是伟大的文明,这种英雄的存在就越是灿若繁星。

正因为这样,对所有的民族而言,保持对英雄的记忆,激发对英雄的情感,都是其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其中,艺术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相较于史籍对于事实的理性陈述而言,艺术中的英雄形象的独特性在于,由于经过特殊的加工和塑造,因此可以更细腻、更活泼、更立体地展现生命存在的真实形态。更重要的是,这种加工和塑造,可以更加集中和纯粹地表现英雄言行的基本逻辑、人格结构和情感空间,因此表现出巨大的感染力和鼓动力。这种过程,其实就是我们在艺术上所讲的“典型化”。

江西省话剧团有限责任公司创作演出的话剧《生如夏花》获得了第九届中国话剧金狮奖。这部话剧是近年来少有的以现实主义手法表现英雄人物主题的力作。要深刻理解这样有力度的现实主义作品,如果不从典型论的角度出发分析,很难达到把握作品的应有的历史和艺术深度。在笔者看来,《生如夏花》之所以能强烈地打动人心,就在于它成功地运用典型化的手法把一个现实社会的英雄典型方志敏塑造成艺术世界的英雄典型方志敏。

首先,作者所塑造的人物是历史、逻辑与艺术性相统一的典型。

塑造英雄人物的艺术形象,不能脱离基本的历史真实。方志敏这样一个人物,从艰难成长的青少年,到出生入死的革命者,再到影响一方的党和军队的革命领袖,最后再成为一个被国民党俘虏的“囚犯”但仍然坚持做地下工作,直至最后牺牲。方志敏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也是英雄的一生。这样壮烈的人生轨迹再加上传奇的生命段落,使得方志敏自然地成为革命题材艺术作品反复选择的典型人物。

毫无疑问,方志敏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英雄人物。这样一个历史的结论,意味着他在人格力量、思想智慧和为人处世方面必然具有超过普通人的逻辑。他必然具有更崇高的情怀、更坚强的意志、更深刻的思想、更勇敢的行动。只有这样的逻辑,才会导向一个英雄人物在历史上的出现。过去的英雄题材的人物,正是遵循这样的逻辑塑造的。但是文艺作品如果仅仅遵循这样的观念,仅仅在通向英雄的逻辑道路上,涂抹更鲜艳的颜色,增加更强大的力度,这是完全不够的。这顶多只是观念地以更大的声音告诉观众,这的确是一个英雄。

《生如夏花》的作者并没有违拗这样的基本逻辑,但是却把这样的逻辑放在更加真实的现实人生的体验中,其实就是更加典型的社会环境中加以理解,这其实是对这一逻辑的深化。作者意识到,无论在现实中还是在艺术中方志敏毫无疑问都是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的英雄,但是这样的人不能把他理解为先验地具有钢铁意志的毫无瑕疵的完人。英雄人物之所以成为英雄人物,当然和他们的主观精神世界息息相关,但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思想和品格是在现实环境中不断被巩固和强化的,他们最终的英雄壮举也是在典型的现实环境中有血有肉地体现出来的。他们不能像神仙一样遇到问题,只要挥舞手中的品格和智慧的拂尘,就可以解决现实境遇的任何难题。

《生如夏花》中的方志敏,一开始是心灰意冷,消沉萎靡的——单单这一点在艺术舞台上就十分罕见。那个义薄云天的大英雄方志敏怎么可以这样出现?但是这样一位寄托着党和人民希望和情感的领导人无论有多少客观原因,最终还是成为导致战斗失败和部队消亡的主要负责人,自己也身陷囹圄——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方志敏越是具有崇高的情怀,越是具有高远的智慧,这样一种结局就越是让他难以面对,他就应该具有更强烈的耻辱感和挫败感。当他真的被监禁的时候,他没有灵魂的震荡是不可能的。《生如夏花》恰恰通过这样一个遭受了巨大打击的近乎垂头丧气的英雄人物的形象提出了一个疑问?——这样的方志敏是如何站起来面对监狱里的新的考验和斗争的?是什么样的精神历程可以让他重新挺起胸脯,为自己的人生画一个惊心动魄的叹号?

再者,《生如夏花》呈现了复杂的典型环境。为了塑造人物的思想和品格,方志敏被放置在四个层次的典型环境中。

第一个层次是在囚室内,方志敏处于伏龙芝、向平、稽如风构成的红十军团领导构成的环境中。在这个环境中,每一个人面对生死抉择都体现出不同的思想、境界和性格。伏龙芝受过正统的苏式军事教育,对中国式的游击战争的灵活性缺乏深刻的认识和理解。稽如风是从基层成长起来的干部,心直口快、敢作敢为,但是他过于依赖自己斗争阅历的经验主义倾向也有十分明显。向平,作为红十军团的党代表,个人性格中有懦弱和善变的弱点,但是他有着丰富的斗争经验和政治智慧,他长期被“左倾”激进的思想和宗派主义毒害。

第二个层次是在监狱中和国民党元老黄逸民的交往。黄逸民和方志敏有着不同的理想信念和人生哲学,但是他胸怀正义,同情革命,服膺方志敏的胸襟和品格。他评价方志敏是一“个真正的傻子”,既表现出他本人不无投机倾向的人生哲学,也反映出他对方志敏大公无私、光明磊落的革命情怀的无限敬意。

第三个层次,也是最具力度的层次,是方志敏和国民党驻赣绥靖公署军法处处长林寒樱的斗争和交锋。林寒樱是一个精明强干的美丽动人的国民党青年军官,直接受命于国民党高层劝降方志敏,林寒樱也的确为了劝降费尽心机。方志敏所面对的林寒樱并非单面化的脸谱化的穷凶极恶的敌人,而是一个仍然有着追求和梦想,并在行为处事上懂得感恩图报的年轻人。在林寒樱身上善良与凶恶、纯洁与污浊、美丽与丑陋、阴柔与阳刚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从而为方志敏形象的多样化展示提供了条件。从剧情本身的逻辑看来,方志敏恰恰是在林寒樱的软硬兼施、步步紧逼的情势下,更加清醒地意识到,即使在囹圄之中,也仍然要坚守信念、坚持操守、团结同志、挺身反抗。

第四个层次是该剧为方志敏的心理活动提供了强大的场域,为方志敏的思想和情感活动提供了充足的空间,也使得他的英雄形象更为丰富和饱满。其中最为突出的是方志敏在从林寒樱处归来的路上,有一大段和妻子、孩子、老妇、老伯、军官和战士的对话。这一段对话,一方面深情地揭示出方志敏为了革命理想抛妻舍子,当革命遭受挫折的时刻内心深处对家庭的无限愧疚,深刻地揭示了方志敏的亲情观。另一方面,把方志敏的这种愧疚自然地延伸向广阔的革命历史的情感冲突和伦理冲突当中。这一大段莎士比亚式的心灵独白,具有震撼人心的情感广度和思想深度。而方志敏作为中华儿女的肝胆和情怀也淋漓尽致的表现了出来。

《生如夏花》就是这样通过典型环境塑造出方志敏的典型英雄形象。这种环境并非一一对应历史的真实,然而在主要关节和情境上却和历史真实有着深度耦合。更重要是这一环境中人物命运推进的逻辑和历史的逻辑完全一致。因此艺术中的英雄方志敏和历史现实中的英雄方志敏就如此让人信服地贴合起来。英雄的血液和呼吸,通过艺术的力量重新进入我们的躯体和灵魂,面对这样的英雄,我们不得不洒下热泪。

艺海观潮

文化部艺术司 中国文化报社 合办